



“四大寇”与关心焉合影，前排右起为尤列、陈少白、孙中山、杨鹤龄，后立者为关心焉（西医书院学生）。

香港策划接应。翠亨村人杨贺是孙中山儿时在翠亨冯氏宗祠读私塾时的同学，后来到檀香山做工。在孙中山等乡亲的影响下，他也参加了同盟会，常捐钱给孙中山。

孙中山南下广州建立政权后，曾聘杨鹤龄为总统府顾问，后又委任他为港澳特务调查员。杨鹤龄1934年在澳门去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曾颁“褒恤令”，称赞他“性行高洁，器识闳完，早岁翊襄总理，倡导革命，厥功甚伟。民国肇造，退隐家园，功成不居”。民国成立后，杨心如留在台湾经商，实际仍为革命党人在台的联络人员。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杨心如本想返回内地参加祭悼，因日本人的监视阻挠而未成行。抗战时期，杨心如隐居乡间，台湾光复后才返回台北居住，表现出一个老革命党人的可嘉晚节。杨心如去世时，南京民国政府明令褒彰，称赞他：“早岁追随国父，在海外创立兴中会，提倡革命，毁家纾难，心切救国。广州惠州诸役靡不参与，几经险阻，百折不回。迨后奉命留居台湾，联络海外同志，声气应求，未尝稍懈。旧勋宿望，党国同钦……”另一同盟会会员杨贺，晚年返乡居住，其儿子曾任翠亨村村长。

不仅如此，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影响下，翠亨村的杨姓青年人不少

参加了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其中最杰出的青年是杨殷烈士。

杨殷字典乐，又名观恩，是翠亨杨氏第四宅的长房长孙，孙中山及杨鹤龄等人的革命事迹常常影响着年幼的杨殷。1911年3月，年仅19岁的杨殷参加同盟会，在澳门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活动，来往于广州、香港、澳门之间传递情报。该支部的负责人即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914年，杨殷参加了暗杀指使暴徒杀害宋教仁的淞沪警备区司令郑汝成的行动，将其炸伤，并乘乱躲进理发店避过搜查。1917年孙中山任职大元帅时，杨在大元帅府任副官，兼任孙中山卫队副官，出入于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后，杨殷到广州西关盐务缉核处任职员。在孙中山晚年与翠亨村同乡的合影中，杨殷也在其中。

1923年杨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杨殷是老同盟会员，他利用过去同三合会等会党的关系，积极发动工人运动，成为广东地区早期工运的著名领袖人物，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杨殷还参加了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军事部长。1929年8月，因叛徒白鑫的出卖，杨殷不幸被捕牺牲。在刑场上，杨殷坦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慷慨就义。

在革命斗争中，杨殷把家中房产、田地，甚至连妻子的首饰，都变卖用作革命经费。在杨殷的带动与影响下，翠亨村不少杨氏子弟成为共产党员，如杨文英、杨文祝、杨文标、杨锦昌、杨锦强等。据杨殷的女儿杨霭兰女士回忆，杨文英在广州起义前曾给周恩来带路、作掩护，解放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翠亨杨氏族人的名字，已写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

孙婉的悲情婚姻

孙中山先生的后代子孙大多都定居海外，鲜有人知的是，孙中山有一位外孙曾在上海居住多年，他的名字叫王弘之，是才子王伯秋与孙中山的掌上明珠孙婉的爱情结晶。他由王伯秋的原配夫人李澄湘带大，直到生母孙婉去世也未能与之相见。

王弘之小时候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叫李澄湘，直到20岁那年，已经上大学的他，在整理父亲衣箱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书“一个广东人的女儿”，是父亲的笔迹。信封里有很多旧照片，上面的人大多是他没有见过的，特别使他注意的是一张护照上的照片，一个年轻姑娘抱着一个小孩既像姐姐，又像自己。也有父亲和这位姑娘的合影。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他生母孙婉和父亲、外国同学、孙科一起拍的照片。

后来，王弘之的祖母去世后，他的二叔和四叔准备分家。分家前，二叔王仲钧告诉他：“你的母亲是孙中山的小女儿。”因为不好向人求证，王弘之只好把这个秘密和所有的疑惑藏在了心底。

直到抗战胜利后，王弘之的养母才辗转地告诉他：“你的亲生母亲是孙中山的女儿孙婉，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以后，王弘之才知道，他的生母并没有去世，养母当时那样讲，是要断了他找生母的念头。

后来，王弘之断断续续从二叔王仲钧那里，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王弘之的父亲王伯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1913年他去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孙中山知道后，就写了一封信说他二女儿孙婉也在美国，年纪尚小，托王伯秋照顾一下。

这一照顾，竟然让孙婉对王伯秋产生了爱意。可王伯秋已经有了家室，为了不伤害孙婉，王伯秋曾写信想把实情告诉孙中山，但是孙婉不同意，把信撕了。1914年7月15日，王伯秋和孙婉结婚了，他们对孙中山先生隐瞒了王伯秋已有家室的事实，孙先生派了儿子孙科来主持婚礼。1915年夏天，孙婉生下了王弘之的姐姐纕蕙。

1918年秋天，孙婉再次怀孕，而王伯秋也想要回国，一是看看母亲，二来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岳父大人，以取得谅解。但孙婉并不想马上回国，最后两人商定先去日本，1919年4月，就在从美国到日本的海轮上，孙婉生下了王弘之。

孙中山了解真相后大怒，坚决反对“一夫多妻”，提出“有李（王伯秋原配夫人李澄湘）无孙，有孙无李”的原则，要求王伯秋与原配离婚才能与孙婉在一起，如果离不了，就断了这头的夫妻关系。

王伯秋回到南京家里，才知道17岁的大儿子得霍乱死了，原配痛失长子，整日以眼泪洗面，伤心欲绝。王伯秋看见如此凄凉情景不知如何开口。于是王老太太定了两点原则：一是原配澄湘不能离异；二是要把两个孩子弄回王家来。孙婉就把两个孩子交给王仲钧带回，并希望他能代为说情，让老太太能容纳她。

谁知，一双儿女从此就与母亲天各一方了。孩子到了南京，老太太就再也不提媳妇了。孙婉给王伯秋寄来一封封信，向他询问事情的进展，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最后，她独自带着忧伤去澳门侍奉母亲卢慕贞。

1921年3月，孙婉嫁给了外交官戴恩赛。夫妻俩婚后生活美满，生女那年适逢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便给女孩起名为戴成功。次年，孙中山登“永丰舰”讨逆蒙难，孙婉又生下男孩，起名戴永丰。

孙婉再婚家庭幸福美满，但每当想起在南京的一双儿女便魂梦不安。1929年2月，戴恩赛受国民政府任命为驻巴西全权公使，孙婉随同出国前，致函前夫、时任立法委员的王伯秋，情词恳切地企盼把儿女带到上海见上一面。王伯秋偕夫人李澄湘按照孙婉约定地点见了面。孙、王分手10年，这次重逢也是最后一面。

虽然养母说妈妈已经不在，但王弘之的心底总还存着一丝希望，1969年，王弘之收到了已去台湾定居的姐姐托亲戚转来的一封信，说她在香港找到了妈妈，希望赶快来会面。但时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海外关系控制得很严，王弘之当时已是专政对象，这样就耽误了一段时

间，结果王弘之错过了和妈妈见面的机会。

1979年5月，王弘之同母异父的妹妹戴成功到上海来接他去香港与母亲相会。但当时正值学校暑期前的大考，身为教师的王弘之请不出假，决定等过了大考再去。戴成功回到澳门见到母亲，拿出与大哥弘之的合影和他全家的照片。孙婉含泪端详，又找出儿子出生时的照片比较，不禁感叹道：“老了，老了，分别时才几个月，现在成老头了！”此后，孙婉热切的盼望着与儿子会面，总是不时地追问女儿“今天是几号？”

弘之也和84岁的母亲一样，渴望7月间飞到慈母身旁同享天伦之乐。但是，6月11日，母亲因思儿心切，情绪激动，血压猛升，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临终的时候，孙婉一直在呼唤着弘之的名字，可最终还是没能和儿子见上面。等了将近60年，王弘之还是没有见到他的亲生母亲，这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魏邦平开辟广州文德路

话说民国七年，即1918年，广州当局成立市政公所，实施即将铺开的拆毁城墙开马路，这项市政建设系统工程公所总办由省财政厅杨永泰兼任。

拆城开路这等大动作自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其中不乏福佬强势集团。那杨永泰来自茂名，新闻记者出身，哪有能耐对付得了广州的地头蛇？有鉴于此，当局便让孙中山的同乡、时年34岁的广东省警察厅厅长魏邦平兼任市政公所帮办。

但魏帮办却是事实上的总办，因为杨永泰负责筹款。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把广州由一个“古代城市”改建成为现代城市，魏邦平堪称开路先锋。

工程一开始，当即遭到“受损群体”的诸多阻挠。今日广州老城区的马路，但凡瞧着不顺眼者，内里大抵有段“古”。单表广州最早开成的马路之一——文德路。

今天的文明路上有座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开马路前，它是广州地区的最高学府，内设广东境内规模最大的孔庙，这座庞然大物始建于

北宋，正式名称是广州府学。府学西侧有条府学西街，至今仍存；东侧是条府学东街，即今文德路。这片地面书院多过米铺，宋、元、明、清四朝，均是广州城内最主要的文化教育区之一。时移世易，辛亥革命以后，广州“孔教会”设于原府学里头，此间便成了守旧势力的顽固据点。

府学北面已开出惠爱路，南面已开出文明路，因之大有必要在府学附近开条南北走向的新马路。



魏邦平像。

首选是府学东街，因为它在清末已经是一条专营文化用品的现成大街，拓宽即可成马路。但遗憾的是在府学东街正北面乃是谁也不敢冒犯的广州城隍庙，若城隍庙所在的忠佑大街不打通，新开的马路便成“断头路”。

另一个合理的选择是大塘街。试想，把大塘街开成马路，跟北面的仓边路相连接，该有多“畅”！但晚至1996年，大塘街内的书院、祠堂犹比当下被视作“市宝”的非遗物质多得多！据此可以推知，魏邦平不敢对这超级马蜂窝造次。

他便左右折衷。据市政旧资料记载，魏邦平曾把规划中的新马路设定在府学东街和大塘街之间。

无奈折衷也不行！时任潮、梅两州镇守使的刘志陆将军一知消息，马上警告魏邦平：他家“刘家祠”位在规划线上，休得蹬手撑脚！

常言道，军是“老大”，警是“老二”，警察厅厅长魏邦平“讲多无谓，食多会滞”，唯有忍气吞声折回府学东街。

既然不得已而在府学东街开马路，尽管北端“断头”。但往南，魏邦平却决意一径开到珠江边。然而，规划线上又有万寿宫和复礼师范梗心梗肺！

万寿宫故址，似在今日的文德路小学一带，当年是广州孔教会所在地。

今日文明路以南的那段文德路，当年陋巷交错，濠涌纵横，其中的清水濠口，即今天的文德路与万福路交界处，由孔教会建了座只有15名教职员的复礼师范学校。

开通马路必须拆掉这两座建筑，孔教会却寸土不让。会长林泽丰豪气干云：“如拆万寿宫，誓以老命相拼！”遗老遗少满广州散发传单，指称杨永泰和魏邦平为“我教罪人”，扬言要如同对待大奸臣秦桧那般，把杨、魏铸成铁像长跪学宫门前，永世遭受万人唾骂。孔教会把事情越闹越大，直至通电北京，鼓动粤籍在京官员给予声援……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魏邦平这次破釜沉舟：马路照开不误！工兵施